

“九·一八”——灾难深重的日子

关士杰

灾难降临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我正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上学。9月19日清晨，我正在盥漱，忽听有人喊叫：“快去看号外，东北炮响了。”我飞快地跑到图书馆。这里早已挤满了人群，都在翘首看门旁那张“号外”。报上大字标题：“日本军于9月18日夜10时12分，突然炮击我沈阳东北军北大营……吉林消息不明……”。

9月21日，北平市各界代表在中山公园，举行抗日救国运动大会，全市下半旗，各影剧院停止放映，表示沉痛。同日，东北抗日学生会35 000人，在法学院开会，以东北学生抗日救国会名义，发表抗日救国通电。

在法学院的我们8名吉林省扶余县学生义愤填膺，有的参加了宣传队，去市内外宣传，有的加入抵制日货检查队，号召各界人民，同仇敌忾，一致对外抵抗日本侵略者。

雪地卧轨

时局继续恶转，噩耗频传，群情愤激。12月中旬，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会发出通知：“凡愿南下请愿的同学，火速报名……。”同学们闻讯，纷纷响应。我东北学生多有当了衣服作盘费而报名参加的。扶余同乡，全部参加了。

队伍组成后，便列队至前门东车站联络车辆。但路局不肯

拨车。我们表示要坚持到底，不达目的，绝不罢休，于是决定露宿卧轨。是时其他各校亦来声援，建议派人去占西车站（平汉路线）进逼一步。然路局亦另有布置，他们决定把平浦、平汉两线的列车，均规定由丰台站乘降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空守东西两站，也就无济于事了。

次日傍晚，我院接到请愿团组织的命令，叫法、农两院前去占领丰台站，就地要求乘车。两院同学立即准备出发。

这天晚上阴云密布，若有雪意，天黑不便认路，指挥部为我们准备了十几盏纸灯，两院男女同学列队出发了。为了互相照顾，前后队以口笛联系。因为不熟悉路途，只得缘铁路线前行。队伍出发将及半时，忽有路局方面人员追赶上来，他气喘吁吁地说：“今日夜半，有一列由天津向北平开来的日本军用车。你们去丰台，途中相遇，怕引起误会发生危险……。”大家听罢，齐声喊道：“谢谢你们的好心吧！我们没有指挥部的指示，是不能更改计划的。”

途中，有时要过桥梁，必须步步踏着枕木前进。桥上没有栏杆，夜里虽有几盏纸灯，也照不清楚。有几名女同学穿着皮鞋，更不便行走，后来她们脱掉鞋，三五人携手前进。

一路上灯火相连，蜿蜒蛇行，笛声不断，所经村庄，群犬狂吠。突然远处红光闪闪，继而传来了火车的吼叫声。日本军车真地开来了。大家不见则可，一见立时红了眼，旧恨新仇，涌上了心头。乃不约而同地拿起了石块，伏于路之两侧，严阵以待。一眨眼间，车身冲近面前。忽听一声高喊：“打！”于是乱石齐发，对准了列车，两侧夹击，势如急风暴雨，只听乒乒乓乓，车上门窗俱碎。火车立刻熄灭了灯光，在车头放出的雾气掩护下逃出了包围圈。谁知冲过之后，又遇到前面同学的围打。远处听去，有如除夕接神的爆竹声。

奇怪地是我们快到丰台站时方才被打的那列军车也退回来了。车上有人喊道：“不要打了，是咱们人回来了。”车停后，才知道该列车受到了几起猛击后，弄得晕头转向，不敢继续前进，不得不停车喊话。接头后才知道这列车乃中国的军用车。车上人得知我们的情况后，并没责怪学生，还把学生们送抵丰台。

南下请愿

丰台一占，果然生效，次日北平车站就允许挂车了。我们接到电话后，便徒走返回了前门车站。时站内已拥满了人群。大、中、小各校，有的来了代表，有的列队前来欢送。到处是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、“收复失地！”、“还我山河，还我东北！”的标语和口号声。群众摇旗呐喊，声震天地；彩旗蔽空，鼓乐齐鸣。真是气壮山河，动人心弦。

车徐徐开动了，不觉离开了车站。但后面的口号声、鼓号声仍不绝于耳。法学二院有一位女同学，高声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。立时大家都合唱起来。真是雄壮有力，气势磅礴。

车抵山东济南，齐鲁大学也正在要求挂车南下请愿，尚未得韩复榘的允许。迨我车到此地时，他们得到了援助，车也就拨给了。又前行至安徽蚌埠，安庆大学亦随之挂车南下了。

我们到南京时，路旁的群众与附近学校的师生们列队欢迎我们。我院学生住在中央大学的风雨体育馆。是时上海、苏州等地的同学也先后来到南京。

鉴于以往赴京请愿团均未得圆满结果，我们乃把请愿团改为示威团，并换了新袖标，以示抗日救国之决心。

次日各地学校，一起列队游行示威。行于某一街中，一辆轿车飞奔而来，意欲切断队伍通过。群众对之不满，于是一拥而上，将车包围。车内坐着一位国民党要员，身穿蓝缎袍，青

色团花褂子，头戴青绸红结帽头，胸前佩一朵红花，花下黄绸条上写着中央党部秘书。学生们对这类官僚、政客本来就有反感。当时流传着一句话：“蒋家天下，陈家党，宋氏一门三部长。”又因其无理蛮冲队伍，于是就把这位要员请出车外。据他说是去车站迎接汪精卫的。学生们要求赔礼道歉。

队伍继续前进到国民政府门前，要求蒋介石接见，被拒绝。后来听说蒋在中央党部。大队乃开到该处，要求见蒋，又未成。当时由于右任出面接见，讲些什么，因人声嘈杂，听不清楚。但大家念于名高望众，乃高喊：“请您退回，今日之事，您无力裁决。”继由南京卫戍司令陈铭枢出面，同学们仍然劝其退回，但这位司令不理睬，仍然在那老生长谈。同学们急了，说你也解决不了问题，还是请蒋委员长出面吧！陈司令依然讲那些陈词滥调。前边有位同学，耐不住性了，他用维持秩序的木杆，推了司令一下，陈由于没有注意，就被推倒了。这回可捅了马蜂窝，突然台后枪声响了，顿时人声大哗，同学们为了自卫，就挟持着陈铭枢退出了党部院。出院后，同学们把陈放在一个胡同口，就各自撤走了。

兴师问罪

第二天中央日报报道说我们是什么“骚动”，是共产党唆使的，是劫车、扣审党国要员，棒打陈司令……。同学们一见非常气愤，认为这是对我们抗日救国行为的有意诬蔑，用心毒辣。

次日继续游行示威，再次要求蒋委员长接见，但仍无人过问。于是又由国民政府来到中央日报社，质问中央日报为何对学生爱国请愿行为造谣中伤？要求抗日、要求收复失地何罪之有？同学们越说越气，在愤怒之下，砸了报社室内几件器皿。当时报社门前人山人海，正在内外吵嚷之际，突然笛声响起，只

见警察与便衣特务蜂拥而至，入室抓人。室内同学见警察特务要大打出手了，乃夺窗而出。谁料窗外是秦淮河，同学们纷纷落水，幸亏河中有许多船户，急忙抢救，救活了许多人，但有的受了伤，更惨的有数名同学竟牺牲了生命。

当我们回到中央大学时，已近黄昏，各队清点一下人数，均有缺额。大家都在担心他们是被捕了或者是被淹死了。去人打听，亦不得着落。夜间队里规定不得外出，以防意外。

次日清晨有人外出小便，刚到门口，便见楼下有着灰军装的士兵，手持大枪，匍匐前进，把我们楼房包围了。他立即返回室内报信。队长立即号召大家要镇静，坐起来不要动，看他们怎样行动。话刚完，兵已冲入室内，枪口对着我们。一个头目喊了声：“不准动！把自己东西收拾一下，到外面站队！”大家听后仍然静坐不动。他又说了一遍。我们有人问他：“把我们送到哪去？”他瞅一眼说：“一会儿就明白了。”接着又有几个人问他，他只说外边有人向你们讲。

我们的队长下令了！“起立！把东西都带好，依次到外边集合！”

外面楼前，有一骑着红马的军官。他身边站着十几名士兵，手端着枪。我们都在想：放下日本敌人不打，对我们耍的哪套威风！军官见人已来齐了，便向我们下口令：立正！看齐！报数！

我们都心含恨，谁肯听他那套立正、看齐，他只得马马虎虎放过不提。可是报数一项，只报了几声便停了。军官急了，他用讽刺的口吻说：“连数都不会报，还讲什么抗日呢！”我们的队长哪肯受他的冷眼，立刻自下口令：“立正！”喇的一声，都站好了。“看齐！”既快又齐。“报数！”只听声音响亮，从头到尾仿佛一气呵成。可把那位军官气坏了，他瞪着眼睛，好久没

说出话来。两旁的士兵也看得出神，他们还相对一笑。

这时天空出现了飞机，在我们头上回旋了一阵，就低飞下来，随之在空中撒下许多彩色的传单，慢慢落在我们的脚下，上面大字写着：“读书就是救国”、“要相信政府……”、“收复失地中央自有办法……。”我们说，国破家亡，谁还能坐着读书！军官一听不耐烦了，他命令式地说：“收拾好东西，送你们回去！别的我无权回答。”

我们被押运到了下关车站，在这儿等船。我组坐在站旁木垛上，与一个来押运的号兵靠近。我读中、小学时吹过号，遂与这位号兵谈起有关吹号的事。接着他说：“我是河南人，当了多年兵，军人的任务，就是保家卫国。可现在日本打咱们，上级叫咱不抵抗，这不是挨打还不准还手吗？这个道理咱不懂。这次叫我们包围你们，是今早紧急集合才下的命令。命令说，如你们抵抗，可用枪把打，你们如开枪，就用枪还之。现在才知道包围的是学生，对学生何必用这么大的举动。来的那位是旅长，不该对你们摆威风。东北学生家都没了，谁还忍心伤害你们！”说到这时，船已来了，他才停住了话。

我们回到北平，已是12月下旬了。

市府请愿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东北留平学生的生活顿时成了问题。回忆张学良进驻北平时，东北学生是到处受欢迎的，曾几何时，情况就大不同了。凡是住在公寓的学生，有的饭费无着，被停了伙；有的连行李、东西都被人扔在外边。这些店家也确实负担不起这笔食宿费用。这类事情经常闹到市公安局，他们也无法解决。寄宿在校的学生，住的虽然不成问题，但是吃的却无处去求，多数是当衣卖物，用以糊口。他们头发长了无钱理，鞋

袜露脚不能换，大有花儿乞丐乞讨街头的样子。我省名画家王庆淮老师当时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读书，就是这样穿戴的。面对这些吃、穿、住的问题，总要想个方法解决才行。学生认为只有要求政府帮助解决。于是组成了东北留平学生请愿团，在“民大”集合后，便打着大旗去北平市政府。但那天是星期日，不办公，没人接待。大家商议一下，都同意在这儿住下，等待明天市长上班再说。这一措施，市府小头头慌了手脚，忙向上级反映。市长鲍贵卿得知后，认为不出头不行了，便安排当晚接见。

黄昏时节，突然有人高声喊市长来了。我们一看，有人高举一把藤椅，边走边喊：“大家躲躲，请让市长过去！”这人身后，紧跟着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，身穿长袍，人们知道这是市长。

市长来到正厅台阶上，向大家扫视一下，便开口说一些什么兄弟因身体欠佳来晚了，叫大家受委屈了。接着说：“早就知道同学们生活有些困难，怎奈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市政府也非常贫穷。大家都见到了咱们市里的马路，多是坑洼不平，早已应当修补，然而无钱难办。外国人经过此地时，该怎么耻笑咱们啊！”他说到这儿，有些同学不愿听了。他高喊道：“那是外国人坐汽车，蹴不蹴屁股的问题。而今天要解决的是东北学生吃住的问题。不要专为外人着想，而忘记受难的老乡！”有的人又插话说：“先想想你家乡的学生吧！”他有些尴尬了。过一会儿他接着说：“兄弟本人不敢贸然决定这样的事情，还得向上级请示。先请同学们回去，兄弟一定给向上转达，尽力而为！”群众又高喊：“我们已无家可归，现在更无舍可宿了，还往哪儿去？不要饱汉不知饿汉饥；我们已没饭充饥了，你们应该管管，不能打官腔向外推了！”最后这位市长说：“好吧，大家暂等一下，

我去商量一下。说完仍由那个喝道人护理着退走了。

约过五六小时后，果然打来了电话，说马上就给同学们发放生活费。大家听了，心甚宽慰。说着现款就运来了，叫各校排好队，按人依次签名领取，市府有人记录。当第一人签名领款后，大家一看，只得两元钱。有人便问：这两元钱是几天的饭费？市府人员说：市府命令如此分法，详情我们不知。群众一听又凉了。于是议论纷纷，结果都认为不能要这两元钱，这解决不了问题，要求派代表再去研究。时已9点钟左右了，多数人都是从早吃顿饭，少数人连饭也未用，饿了一天，只得用白水灌肠。因又饿又累，都悄悄地找个地方休息去了。市府的正厅与西厢均被占用。

休息时同乡之间，都在互问近况以及家乡音信，仿佛尚不知饥困。有的面色苍白，时而悲叹，时而激愤。大家说：“这些贪官、军阀，只需百姓养他，不知保国爱民，致使我们有家归不得，有书读不下……。”

夜深了，人们多有倦意，室内安静下来。朦胧间，忽听得有人泣哭。只见西北墙角处倒着一位女同学，她身穿布旗袍，脚下扔着一双夹鞋，看样子不过十七八岁。有人说她是弘达学院的学生。只听她边哭边说：“关内外交通隔绝，不知爹妈都跑到哪里去了，是否还在人间？如果活着，对我这在外的女孩子，又不知怎样挂念呢！想起家来睡不着，吃不下。前天傍晚，我走到西单马路上，电车铃响没听见，差点没让电车撞上。人家看我象个傻子。”讲到处，她又“妈呀，妈呀”地大哭起来。旁边有人劝道：大年快到了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我们东北学生，体会最深。日寇铁蹄残踏我国土，蹂躏我人民，令人悲愤，但中国是不会亡的，早晚要把日本鬼子打出去，一定打出去！

话音未落，忽听东厢房也有人喊打，大家听了一愣。是否

他们同情我们给我们鼓劲呢？侧耳静听，果然听到有人喊“打！”并清楚地听到了打人声。屋内人说声不好，一齐奔到门口。门一开，先露头的猛然吃了一棒。大家急了，齐喊你们为什么打人？欺压学生算什么英雄，有种的去打日本！但一群疯狗，不懂人语，仍喊着“打！打！打！”

屋内的同学怒不可遏，有的拿着椅子，有的拿起壶碗等物，要冲出相拚。一位同学忙劝道：“咱不是来打仗的，这样拚，只会使亲者痛而仇者快，并且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。”一场恶斗避免了。

当我们走到外面，见院中站满了军警。有身背大刀腰挂盒枪的，有手持长枪或黑红棒的，好似恶狼一样，到处乱扑，把我们赤手空拳并饥寒交迫的学生们，连推带打地拖出了门外。他们是集中全力面分屋分批地将我们赶走的。

子夜，人们正在酣睡中，而北平市政府附近突然喊声震天。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、“收复失地！”、“打倒贪官污吏！”的口号声经久不息。

除夕思亲

可怜的东北学生，家乡被占，生活无路。年关将至，谁不思亲？他们的苦恼，能向谁诉？有谁过问？实在过不去了，辽宁籍的同学被迫找了张学良，黑龙江省的见到了万福麟，向他们问一问家乡情况，求他们照顾一下目前生活。据说他们都略有所得。惟独吉林学生，见到了张作相，张反向学生们报起苦来。他说：“人家学良有兵权，命令好使，有力有势，可以照顾同学。万福麟儿子国宾，曾掌财权，又有几旅兵力在关内，也能活动。惟有兄弟于事变当时正在原籍办理亲丧，身边无财无势。往昔给吉林省府，打个电话，可谓一呼必应。而今去信，那

熙洽能听咱指挥吗？”说时不胜感慨。最后他指院中一辆旧汽车说：“有人能买，把它卖掉，好为同学们过年。我说了就算，绝无虚意。”

这些消息，传到了天津市长萧振瀛耳里，他对扶余学生说：“照顾全吉林省的，我力不足，单为扶余老乡花点，尚能尽力而为。请把老乡名单写来，容我斟酌办理。”结果扶余老乡，每人各有20元的意外收获。

日本军阀为了配合侵略平津，阴谋收买我国一些地痞流氓，唆使这些败类，夜间持枪出来骚扰。使我商店不能正常营业，百姓不敢在街停留。天津每天都有抢案发生，报纸上天天登载此类消息。

1933年旧年三十晚上，关内的同学们都回家过春节去了。剩几名东北学生，孤苦伶仃守在宿舍里。我院老柏、小杨都来到我这里。大家想以酒解愁。惟有酒无肴难下口，只得买几个冻柿子，回来边啃边谈心。

老柏忽然站了起来，把墙上的京胡取下来，然后说道：“我们不能苦闷度大年，来！我唱你拉。我给你们唱一出新四郎探母。”我这胡琴过了门，他即高声唱起：

柏××，坐学院，自思自叹，
思起了，当年事，好不惨然。
我好比，笼中鸟，有翅难展，
我好比，虎离山，受了孤单。
我好比，南来雁，失群离散，
我好比，浅水龙，困在沙滩。
恨日本，贼强盗，家乡侵占
汤玉麟，率官兵，东逃西奔。
义勇军，发誓言，还我河山，

我流亡，在北平，有家难还。
二高堂，与兄妹，不能团圆。
贼熙洽，引多门，吉林来占。
扶余县，李海清，日满推翻。
我有心，回家乡，体会一遍。
怎奈我，身在乎，远隔天边，
思老娘，思得我，肝肠痛断。
眼睁睁，高堂母，难得相见，
要相逢，除非是，梦里团圆。

他唱之后，小杨问道：“你这是哭，还是唱？拉的也噪音，不悦耳。”

“俗语道：人得喜事精神爽，快乐时的唱、拉，听也令人愉快。我今狂歌，用以消愁，何乐之有！”老柏解释一下。

我们正在心绪紊乱之际，忽听爆竹声响。

噢！已到接神的时辰了。

咱家怕是不能有此举动了！

能吃上接神饺子吗？

能吃也无心做了。

说到这儿，有人推门而入。原来是校役杨瑞。小杨问：“老杨，你来拜年来啦？”

谁想杨瑞沉着脸，带着惊慌的神色说：“外面响声，不是炸炮，是日本兵的枪声，可能是日本人要闹事。我从家来时，听说街里断行人，戒严了。许多中国兵包围着日本人，怕他们冲出东交民巷来骚扰。”

“日本人也欺人太甚了！”老柏气愤地说。

小杨接说道：“这是轻者，我们东北三省外加热河，不是都被他们侵占了吗？”

“强权之下，无公理！”

“公理一定胜强权！不然何谓公理！”

走投无路

1933年5月的一天，日本飞机9架，飞抵北平上空。我院学生，均至地下室暂避。传闻日军已迫近通州，北平形势紧张。前门外东西两站，包裹累累，南运物资，堆集如山。各学院亦自行解散。院方准备迁移，迁往何地，其说不一，但事先均未通知学生。我住的寝室楼，仅存我与山西姓孙学生二人。孙催我说：“你还不走，等待何时？日军来了，学校肯定被占，那时怕走不出了。我奔平汉路，尚有车可通，你则不然。”

我到了走投无路之时，眼看不走是不行了。校役杨瑞看我为难，诚恳地劝我说：“关先生，不必愁，日本人来时，你可到我家。”在这种局面，有人能说出这样话，该使我怎样地感激呀！可我一想杨瑞，每月工资两元，鞋袜经常露脚眼，吃饭依靠师生们在年节假日赏给点钱。年近三十，方才结婚，夫妻同老母共居一间小屋。我怎能留宿他家，且饮食有谁能供给。我含着感激之泪，向老杨谢绝了。

形势逼我走后楼，找到了小杨商量一下。杨说：“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！我们不走是不行了。可山海关在打仗。只得由天津乘海船去大连转道而归。可是听说大连海关，日人盘诘甚严，辄有被穿上鼻铜子或以铁丝穿耳朵，而投之于海者，真是惨无人道！”

我说，日本军警杀人如儿戏，这样事能作出来的。不过，他也要老虎带念珠，装一下假善人。如杀人无戒制，他这条道也就无人走了。

我把所有的衣被、用具、书籍等全都纳入条包而送进当铺，

以换取路费。起初当铺不肯收留，说仓库已满，无处存放了。经再三说明苦衷，才给了一条生路，当了5元钱。

在由平去津的车中，报童叫卖报纸，说有重要新闻。我们买了一张，见一版头条大字标题：黄郛北上、华北时局有急转直下之势……。第四版则登有北平各大学的启事，内容为通知学生返校，准备学年考试……。

杨问“咱们怎么办？”

我说：“咱们回校，不单无伙食费，连被褥都没有了。”

回到扶余后，由于国破家亡，家里已无力供我返平读书，因而做了14年亡国奴。

（扶余市政协文史委供稿）

柳条沟系柳条湖之误 ——有关“九·一八”的两点考证

李若松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系日本关东军伪造“中国军队炸毁柳条湖附近之南满铁路”为借口，进袭北大营，随即占领沈阳。此系日本军部蓄意侵略中国满蒙之一步，其后之一发不可收拾，国人已耳熟能详。日本虽屡次试图篡改其侵华历史，事实俱在，铁证如山，恐怕很难能够达到目的。

此处笔者仅就所见资料，对日关东军自导自演炸毁南满铁路之地点名称及部位，稍加考证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铁路爆破地点的地名问题，历来的说法很多，如“柳条湖”、“柳条沟”、“柳河沟”、“柳河桥”、“柳条湖